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

张海英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张海英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ISBN 7-5617-0993-5

Ⅰ．明...　Ⅱ．张...　Ⅲ．商品流通—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Ⅳ.F7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8013号

* 华东师范大学中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
著　　者　张海英
责任校对　黄清根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1.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02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年1月第一次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 7-5617-0993-5/F·032
定　　价　1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1
一、学术史回顾……1
二、本书的分析框架与基本思路……13

第二章　商路与商品流通格局……18
一、商路发展的生态基础……20
二、商路发展的经济基础——苏杭城市功能的重新审视……24
三、以苏杭为中心的主要商路……35
四、小结：商路——经济与人文的多重内涵……78

第三章　明清江南内部的商品市场分析……83
一、棉花市场……84
二、蚕丝与桑叶市场……94
三、其它生产资料市场……112
四、粮食市场……117
五、棉布市场……130
六、丝织品市场……147
七、茶叶及其它生活资料市场……156
八、小结：明清江南内部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16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明清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经济联系……172
一、明清国内市场的变化……173
二、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182
三、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联系——全国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197
四、江南与西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官方市场强有力的支持……212
五、江南与北方地区——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基础上的经济交流……230
六、江南与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245
七、小结：明清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经济联系的总体平述……254

第五章　世界市场与江南经济的发展……263
一、明清海外贸易综述……263
二、朝贡贸易……269
三、江浙沿海的走私贸易……276
四、对日贸易……285
五、南洋贸易与太平洋丝绸之路……296
六、欧美贸易……303
七、北方中俄贸易……314
八、小结：世界市场对江南经济的影响……320

第六章　明清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的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326
一、市场功能的进一步深化……326
二、与全国市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328

三、受海外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331
四、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332
后记……336
参考文献……338

第一章　导　　言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与市场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关于唐宋的草市》一文，开始对中国唐宋时期的地方草市进行研究。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唐、宋、清代城镇及市集的分布、运作性质与活动内容予以探讨(1)。50年代，藤井宏在其《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中，敏锐地注意到江南市镇的兴起与同时期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2)。此后，斯波义信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都市史研究及宋代江南村市、庙市及部分市镇个案研究的系列文章，虽然其内容并非直指明清市镇，却为明清江南经济的研究铺垫了前期基础(3)。从7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学者开始以明清江南市镇及商品流通为主题，从地理环境、水陆交通、会馆公所、榷关、米粮流通与棉布业发展、海外贸易及政策等方面，开始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工作(4)。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与资料处理之严谨给中国学界以有益的启示。

西方研究中国市场以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理论影响最大。他在“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al of Asian Studies，24-1.2.3.，1964—1965）(5)和“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1977）(6)等著述中，运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相结合的新方法，从区域发展的新视角，探讨农村集市的等级结构及其性质。他通过对四川成都平原的实地调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了农村市

集、市镇分布的六角型模式。施坚雅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以基层市场为中心形成共同体的，基层市场是能满足农户所有基本贸易需要的农村集市，它不仅是市场区域内农户交换商品的场所，而且是农产品、手工业品上流至更高层次市场体系的起点。他把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明晰的模式，使人们能清楚地看到自然村、集市、市镇、县城等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关系及市场与中国基层社会的密切关系(7)。施坚雅以其新颖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中日学人袭其概念套用其方法的亦比比皆是”，“影响所及，东西方中国聚落史学界俱奉为圭臬”(8)。

中华书局于1986年和1992年翻译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书，黄氏学说引起人们的关注。黄宗智认为，造成中国未能迈向近代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经济的“过密性”特点。他指出，各类商品生产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潜力，可按其等级系列来考虑。谋利推动的商品化模式下小农生产，在合理化、资本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显然最具潜力。但是，农民为糊口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以及为家庭急需而借款，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并不起什么作用。通过劳动密集化而提高总产量，一般依赖于动员未充分利用的、或未经利用的劳动力来实现，是以单位工作日收益递减，而不是通过生产的资本化来实现的。假定所有形式的商品化和所有类型的市场都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经济发展相联系是说不通的。明清和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商品化与其说是质变性的，不如说是过密型的(9)。这种过密型商品化导致过密型家庭生产，使用低报酬的家庭劳动力，形成一个无法与之竞争的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虽可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则是逐渐递减的。他进而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10)一文，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予以深刻的反思。黄宗智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1)，虽然赞成与反对者兼而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之，但尚未受到全面有力的挑战，可说是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又一新高。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及市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1934年至1937年，《食货》杂志陆续刊载陶希圣《搜读地方志的提议》（1934年）、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1934年）和吴景超《近代都市研究法》（1935年）等文，明确提倡中国都市史的研究。1934年，全汉升发表《中国庙市之考察》，1937年，何格恩发表《唐代岭南的墟市》等文，开始将目光转向庙市与墟市等地方层级的小市场⑿。到20世纪50—60年代，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讨论中，大陆学者开始较多地注意到了明清市场的活跃及市镇的兴起，并在资料的收集编撰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当时多局限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思维框架，其研究往往带有公式化的痕迹。

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⒀一文，被视为明清江南市镇正式成为学者探索的主题。傅先生在文中强调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主要是基于该地区商业与手工业活动的发展，就商品流通的范围而言，这些市镇的商业活动多已超出当地地方消费范畴而逐渐纳入全国性的、远程贸易的市场体系中。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是颇具新意的，但由于“文革”的爆发，整个学术研究陷入停滞。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研究的日渐复兴，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引进，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和深入。与此同时，明清经济史及江南市场经济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课题。

在对中国传统市场的宏观研究中，吴承明先生在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系列著作中⒁，阐述了对明清市场的看法，指出，从总体上看，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

模式中，主要商品即粮和布，还都是农民家庭生产的，作为主导地位的工业品棉布，其生产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乡之间的交流很小；粮和布的长距离运销在整个商品量中还只占较小比重，粮食的长距离运销又主要是由于某些地区缺粮引起的，这说明明清全国性市场的扩大很少反映地区分工，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这就造成了市场的狭隘性和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⑮。这些看法在明清市场的总体把握上至今仍具有代表性，影响很大。

青年学者龙登高在其《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⑯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江南区域市场的发展。他指出，以江南为主体的区域市场，在宋代最先形成较完整的区域市场体系，明清时期较之宋代，它与外界市场的联系不唯在商品种类上，而且在程度上已出现飞跃性的进步。区际贸易的展开，使江南市场的发展获得全国市场的支撑与依托。专业化市镇的成长促进了市场网络的有机性与细密化。虽然不少巨镇的发展凌驾于一般府县城市之上，但苏州、杭州、南京及后来的上海是任何巨镇所无法超越的，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吸纳力与辐射力加强了全区域的整合⑰。该书也填补了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历史总体研究的空白。

就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微观研究而言，可谓学者云集，佳作迭出。

台湾学者刘石吉在70年代末撰写了其硕士论文《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后几经修改，以《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和《明清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等三篇论文于1978年分别在《食货》与《思与言》杂志上发表，开始对江南市镇进行有系统、全面性的研究。1987年将三篇文章复集成书，名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几篇高水平的论文对当时大陆已经起步的市镇研究颇具启发与带动作用。

樊树志先生在其专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以翔实的资料，精微的个案研究展现了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发展与整体面貌，他尤其

强调由网络与结构而非孤立存在的角度来探讨江南市镇，并指出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网络体系及市镇本身的发展在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⑱。在其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中，对明清江南市镇的各个层面如各类丝、棉布业专业市镇的兴衰、各类市镇的实态分析、粮食市场与米市和棉纺织品的内外贸易等，均有详尽论述。

陈学文先生着重对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经济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主编的《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和《中国城镇史论著资料索引》等资料集，为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必不可少，可谓嘉惠学林良多。《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⑲是他挟搜集整理杭嘉湖城镇经济史料积累之优势，在发表了关于双林、南浔、新市、硖石、长安、乌镇、濮院等经济市镇的个案研究的系列论文之后，编著而成，其对部分市镇经济结构微观研究之深入，尤显功力。其《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一书，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以往不太被人重视的明清时期的民间商书，在原始资料的进一步开拓及研究视野的扩展方面，颇具启迪作用。

王家范先生在其《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一文中，亦强调了市场网络在江南市镇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尤其对“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被套用于江南市镇史研究的方式持明确的批判性态度。他指出，作为“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业作坊，实际于江南市镇中寥若星辰。家庭手工业及副业遍布农村，宛如汪洋大海，绝大多数的江南市镇对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实难有较大的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因而要澄清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意义，必须超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的窠臼，做多维的思考⑳。这一观点至今影响学界同仁。

陈忠平则在其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对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布号与布庄、牙人与牙行、徽商、闽粤商人的活动状况、人口考察及手工业

的发展等予以详尽考察，并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成果卓著(21)。在对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考察中，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于城乡之间、内部各区域之间及江南与外地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经济实体的发展则是城市与市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展。江南市场体系由三个等级：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及城市中心市场构成。市场的总体由生活、生产资料及加工成品为主的商品流通活动构成，已具有供给生活、生产资料及提供产品销路这样相对完备的市场功能。其考察之详尽，资料之扎实值得称道。

范金民在其《江南丝绸史研究》一书中，对明清时期江南丝绸的国内、国外的市场贸易予以详尽的分析，指出明清两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是与江南丝绸生产的特有优势、各地对江南丝绸的依赖和社会时尚对丝绸的追求等密不可分的，并强调，清代以江南丝绸为主的中国丝绸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22)。其新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全方位论述了明清时期江南商业的发展，诸如江南地区的商品流通、商品市场、江南的商人商帮以及商业的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其中“江南的商人商帮”一节，对安徽、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浙江和江苏等地商人在江南地区从事的商业活动及其经营的具体行业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统考察，并对上述商人、商帮的活动时代、经济实力、活动地域、从事的行业及经营商品的种类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体现了近年来关于江南地区商品市场研究的最新成果(23)。

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24)以史料丰厚见长，其各篇的编者按语尤独具匠心。刘秀生《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25)从全国棉布的生产和销售考察了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及销售区域的缩小，指出棉布业生产技术的停滞不前是其衰落的内在原因。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一文，分析比较了清代江南、华北、珠江三角洲、长汀中上游地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及边疆地区等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相互的经济交流，肯定了商品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指出流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更为重要的是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促进各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和《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等文，则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清代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化及其经济意义，指出，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明清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26)。其文章资料之翔实丰富，视野之广阔，驾驭材料之大气，令人钦佩。

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全面考察了明清江南地区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诸如丝棉纺织品的输出和稻米、豆麦等的输入等，指出，由于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明清江南地区在经济上已不复能自给自足，江南经济日益深入地卷入了正在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和国际地区分工体系。其新近发表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和《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对以往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予以理论上新的探讨，他认为，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他的这些观点，反映了目前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27)。

此外，还有大量的论文更是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诸如明清江南地区的社会变迁、农村经济、经营形态、消费经济、商品的市场流通、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以及各类商业市镇的个案分析等等，将江南

经济置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动态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其进行了广阔而深邃的探讨，研究领域几乎涉及江南经济的各个层面。而除江南地区外，目前国内学者对岭南(28)、山东、西北、东北、江西、四川、两湖等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区域市场均有研究(29)，这些成果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江南市场发展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江南与各区域经济比较研究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综合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市场史的研究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淀。总体来说，海外学者在理论及方法论方面有其新颖之处，但其资料与理论框架的结合需要在中国本土上开展进一步的实地考察，以修正其理论构架的不适应性；国内学者材料基础堪称扎实，但在理论创新、跨学科研究方面尚需努力。目前已有学者借助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等新的学术方法，对明清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综合性研究，并特别注意实地考察和发掘新的官方档案及民间材料。这种努力值得称道，它也代表了今后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1）加藤繁：《关于唐宋的草市》（1926年）；《宋代都市的发展》（1931年）；《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1933年）；《唐宋时代的市》等文。参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此外还有《清代に於ける村镇の定期市》（1936年）。

（2）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1952）。译文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斯波义信：《围绕中国都市史的研究概况》；《中国都市史的新动向和二三个模式》；《中国中近世的都市和乡村》；《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宋代湖州镇市的发展》（1975）；《中国中古近古的都市和农村——都市史研究的新视角》（1982）。转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绪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另外，斯波本人代表性著作可见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汲古书院，1988年）。中译本《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4）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の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について》（1979）；《长江デルタにおける镇市の发达と水利》；林和生《中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につ いて》（1983）；《中国近世における地方都市の发展——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1984）。该材料蒙华东师大地理系谷人旭博士所赠，谨致谢意。

此外还有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一书（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2年）；林和生《中国の地方都市——镇·小城镇——》（河野通博编《世界地志ゼミナール〖1〗新订东アジア》，大明堂发行）；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杭州と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1号）；《清代中期の浙西における食粮问题》（《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山本进《安徽米流通と清代崇明の棉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3册）；王卫平《清代（康熙～光绪年间）江南都市の公所——苏州を中心として——》（《史学研究》第210号）；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と农村》（《史潮》新8,1980年）；《辛亥革命期苏州府吴江县の农村绢织手工业》（小岛淑男编《近代中国の经济と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版）；松浦章《清代の扬州关について》（《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3卷第2号）；《晚清期上海·南市の沙船航运业》（《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6卷第1号）；《明清时代の使琉球封舟について》（《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5卷第2号）；刘序枫《十七、八世纪の中国と东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贸易政策を中心に》（沟口雄三等编《アジアから考之る〖2〗地域システム》，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5）（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一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8）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新史学》九卷第三期。

（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0）该文全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1992年11月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1）讨论详情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4期和1994年第1期。

（12）范毅军前引文。

（13）文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收入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许涤新合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理论与市场史》，载《平准学刊》第3辑下册。

（15）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6）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7）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18）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绪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此外，樊先生还著有关于江南经济史研究的系列论文：《明清时代的濮院镇》，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明代浙江市场分布与结构》，载《历史地理》第五辑；《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中心》，载东京《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湖州府为中心》，载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十六号；《明清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微观分析》，载《史林》1986年第3期；《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5期；《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载《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南浔镇与湖丝贸易》，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南浔：明清市镇的微观分析》，载《平准学刊》第四辑；《明清长江三角洲粮食业市镇与米市》，载《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江南棉布业市镇与棉布贸易》；《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

（19）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年。

（20）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21）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载《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载《江淮论坛》1986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载《学术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的发展》，载《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明清时期长江、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比较》，载《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2）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年。此外，范金民还发表了《明代丝织品中派述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载《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官方丝绸贸易的数量、品种和色彩诸问题》，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系列文章。

（2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4）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5）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刘秀生还著有《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清代中期的三级市场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代内河商业交通考略》，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等相关论文。

（26）《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此外，许檀还著有关于明清商品市场与流通方面的系列论文：《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与经群健合作），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载《燕京

学报》，新三期。

（27）《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此外，李伯重还著有《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的系列探讨文章。

（28）在各区域市场的研究中，以叶显恩、罗一星、刘志伟、陈春声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派在方法论与理论上最具代表性。

参见叶显恩谭棣华：《明清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载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分布特点》，载《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陈春声　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春声在其著作中，借助电脑处理了档案材料中数十万个数据，从米价的角度对18世纪广东市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方法论上代表了目前国内市场研究的高新水平。他在和刘志伟合作的上文中指出，清代广东区域市场结构的有机性和有效性可以和同时期法国或20世纪同一区域市场相媲美，但经济变化的性质与前提，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本身的因素或关系，实际的经济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尤其在传统社会，经济动作更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之中，在特定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下进行的，其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非经济因素同经济关系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与方式。清代的经济运作中，存在着“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和“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两个特点，直接影响着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观点至今读来仍颇具启发。

（29）其它的区域研究的代表作有：

西北：林永匡　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